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司徒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檢基議員

何敏嘉議員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華明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黃秉槐議員，M.B.E., F.Eng., J.P.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陸恭蕙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陳榮燦議員

陳婉嫻議員

鄭明訓議員

朱幼麟議員

何俊仁議員

葉國謙議員

劉漢銓議員，J.P.

羅祥國議員

羅致光議員

李啟明議員

梁耀忠議員

廖成利議員

吳靄儀議員

單仲偕議員

曾健成議員

謝永齡議員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任善寧議員

缺席議員：

倪少傑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黃震遐議員，M.B.E.

李家祥議員，J.P.

涂謹申議員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鄭家富議員

鄭耀棠議員

張炳良議員

張漢忠議員

蔡根培議員，J.P.

劉千石議員

羅叔清議員

莫應帆議員

顏錦全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行政局議員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C.B.E., J.P.

行政局議員財政司曾蔭權先生，O.B.E., J.P.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依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出席會議，向本局致辭，並接受質詢。

主席（譯文）：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歡迎總督。

秘書（譯文）：總督先生。

主席（譯文）：總督將會就其到菲律賓之行作出聲明，並會回答有關香港經濟的質詢。議員可就所提質詢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質詢，但只限於要求闡明某點。

總督（譯文）：主席先生，首先我會簡單講述我今次菲律賓之行，然後我會很樂意就該問題或整體經濟問題回答各位的質詢。

我在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訪問菲律賓，這次訪問非常有用，並且取得成果。我非常感謝拉莫斯總統誠意相邀，並對我和同行人員熱情款待，尤其感謝菲律賓當局昨天為我返港的行程作出安排。

我在星期一跟拉莫斯總統共進早餐，彼此商談了整整一個小時。其後，我和馬尼拉大主教占辛恩會面，又在亞洲太平洋大學主辦的一次研討會上發言，並向本港及菲律賓的商界代表致辭。星期二早上，我和菲律賓參議院院長干沙雷斯和參議院外務委員會主席瑪些打議員會晤。此外，我亦前往蘇碧灣參觀，目睹當地正進行多項大規模的發展計劃，其中當然包括一些由香港投資的項目。

我相信此行有助於令港菲之間的緊密商貿關係更形密切，並加強我們在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中的夥伴關係。香港是菲律賓第二大的直接投資國家。去年，我們在菲律賓投資了大約2.9億美元。由此可見，菲律賓未來的發展與我們存着重大的利益關係，而港菲兩地保持良好的整體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亦有機會與拉莫斯總統和其他人士討論現居於香港且為數不少的菲律賓人的情況，他們大部分（雖然並非全部）皆受聘為家庭傭工。我向拉莫斯總統保證，我們會繼續盡力確保這些家庭傭工會獲得適當的法律保護。拉莫斯總統和他的同僚代表現居於香港的家庭傭工，就香港政府和全港市民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向我們致謝。

我亦藉這個機會，向拉莫斯總統提出了一件令香港和菲律賓之間原本良好的關係蒙上陰影的事件，就是區永祥先生及黃銓明先生自一九九一年起在馬尼拉身陷囹圄的事件。我亦派遣了一名人員前往探望區先生和黃先生，向他們強調我們非常關注他們的情況，並向他們轉述我和拉莫斯總統的商談內容。各位議員也知道，香港社會、立法局和傳媒都非常關注這件事。我們會繼續密切注意區先生和黃先生的情況。我會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並會與菲律賓當局保持緊密的聯絡。英國駐菲律賓大使館人員會繼續定期探望區先生和黃先生，並會向我們匯報有關的情況。拉莫斯總統向我保證，他明白香港各界對事件的關注，並表示會就此事與司法部接觸。我向拉莫斯總統表示，我們無意干預菲律賓的司法程序，只要求菲律賓當局盡快進行有關的司法程序，因為區先生和黃先生都已苦候多時了。我們都十分關注這兩名香港市民的情況，相信菲律賓人民和菲律賓政府都不會對此感到驚訝，因為菲律賓當局同樣關心那些在海外身陷困境的菲律賓人。

因此，我重申這是一次行程緊湊而有用的訪問。我現在歡迎各位議員向我提出質詢。

主席（譯文）：打算提出質詢的議員請舉手示意。張文光議員。

張文光議員問：總督先生，香港的經濟有賴法治的制度。大家也知道，昨日魏京生被北京的法院裁定陰謀顛覆政府罪名成立，判處14年徒刑。這事件表現了中國在司法方面的草率及不公平，在香港引起很強烈的輿論反應，亦令香港人對九七年回歸之後法治的前景感到憂慮。根據中英雙方過去就終審庭達成的協議，特區政府的終審法院是無權審理一些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這條文令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出現很大的漏洞，使中國的法律觀念可以引申到香港。根據本局通過的終審法院條例草案，顛覆中央政府的行為將來是有可能被視作國家行為，導致香港的法庭無權審理，令香港在九七年後有機會出現“魏京生式”的政治審判。請問總督先生有否考慮要填補此漏洞，以消除港人的憂慮；又會否採取行動，及採取甚麼方法向中國政府反映香港人在這方面普遍的憂慮？

總督答(譯文)：首先，有關香港的經濟前景與香港的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我同意這位議員所說，而香港的經濟前景正就是我今天擬答覆各位議員質詢的主要題目。有些人不時宣稱自己是為香港人說話，或者是為香港的商界或經濟利益說話，但卻說本港的自由、多元化價值觀、立法局的問責性等跟本港的繁榮毫無關係，這是個幼稚的說法。關係是明顯存在的。當你到本地區

內其他國家走走，當地的人都會向我或者向其他人明確指出這一點。如果香港不是這麼自由的話，現在也不會這麼成功。因此，我與這位議員意見相同的第一點就是，香港是一處怎樣的地方，與香港多年來在經濟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之間，有着清晰、明確而密切的關係。

當然，多年以來，對於那些要避開外地所發生的各項事件的人來說，香港無疑是一個避難所。他們來到香港，都十分容易和清楚地感受到居住在一個自由開放社會中的優點。

其次，我們從立法局及社會最近所表達的關注當中得知，香港將來的生活方式和香港將來對公民自由的保障，對各行各業的人，以至對香港不同背景的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知道，當有些人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方）的官員說，他們認為香港應該這樣那樣的時候（有時候，我覺得這些似乎都是頗為不智的），而又當中方官員說要撤銷人權法的精髓部分，又說要撤銷那些使我們的法律架構得以符合國際公約規定的法例的時候，着實使香港社會感到憂心如焚、關注莫名。這些不是我杜撰出來的。如果說有甚麼不同的話，我也只是過於輕描淡寫罷了。我們只需看看全港中文報章差不多所有社論對這些事件的評論，便已經一清二楚。立法局在投票的時候，也顯然是反映社會上絕大多數市民的意願。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像昨天魏京生判刑的事件在社會上再次引起關注，實在不足為奇，因為我們可以理解到，市民憂慮在一九九七年以後，對我們或他們的保障到底有多實在。

現在，我想補充兩點，首先，一如這位議員所知，我並不同意他說，到了一九九七年以後，在今夏所達成的《終審法院協議》會容許任何人肆意踐踏香港奉行的英國普通法制度。如果認為在《基本法》（即香港的憲法）和普通法之間必然存在的矛盾，不會在香港的獨立法院，由獨立的司法機構排解處理的話，這樣未免是失敗主義。我們一定要明瞭這一點。

第二點，我可以肯定，亦可以理解得到，國際社會必然會就魏京生的情況表達關注。英國政府是香港現時的宗主國，與歐洲聯盟一起，亦強烈支持歐盟在十二月初代表魏京生所表達的態度。我可以肯定，英國政府會與歐洲盟友和其他國家商討，看看還可以採取甚麼行動，以說服中國當局，使他們理解到，魏京生現時的遭遇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並且難免會影響他們對中國的態度。中國洋洋大國，作出這樣的行徑，實在令很多人感到詫異。有充分理由對此事最感關注的莫過於香港人自己，因為一九九七是香港自己的事，不是任何其他人的事。

張文光議員問：總督先生，《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訂明特區政府的立法會會就叛國、煽動叛亂、或顛覆行為等問題立法，而中國政府，甚至預委會亦認為有關的立法工作要在九七年後才處理。請問港府會否繼續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爭取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述的立法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磋商、溝通，甚至考慮在九七年前先就這方面進行立法？因為這方面，尤其是有關叛國、煽動叛亂及顛覆政府的定義問題，以及將來對香港的不同政見者的影響等，都會有深遠的影響。

總督答（譯文）：這當然是我們所希望能夠做到的。我們曾經在聯合聯絡小組上向中方官員提出多項建議，舉例說，有關官方保密事宜，以及這位議員剛才提及的問題。我們認為，我們的建議完全符合國際公約、《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我希望可以在這些事情上取得進展。

由於香港現在所處的獨特處境，這些事件在社會引起的回響和產生的影響都更形強大和顯著，而且亦使這些事件顯得更為重要。舉例說，在正常情況之下，我相信立法局不會有人特別憂慮官方保密的問題。據我的研究人員告知，我們從來不曾真正引用過官方保密法檢控香港任何人；然而，由於我們的處境獨特，並發生了像昨天的事件，立法局議員和整個香港社會都對這類問題更感關注，因為這些憂慮會對市民的企望、抱負和對生活方式的關注構成陰影。

我重複一次，立法局、當局和香港總督都沒有捏造這些憂慮。如果有人使中方官員有這個印象，或者有人在美國或其他地方發表談話的時候，使人以為這些只是無中生有的事情，那麼他們便大大對不起香港了。

主席（譯文）：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歡迎你在外幾番努力之後回到香港。我相信三是個幸運號碼。

我本人、立法局內許多同事及旅遊業，非常感謝你向菲律賓當局提問區、黃事件。四年來旅遊業一直密切注意這事件的發展，而這事件最近提升至由立法局討論。

在你離港期間，我們在電視上看見探望區先生的情況，他好像要傳達一個信息：他可以選擇放棄上訴，只等待赦免。這個信息使我有點疑惑，我當時懷疑，這選擇是否總督先生你與菲律賓當局討論這事件時提出的呢？而當你的助手前往監獄探望他們時，他們有否表示他們實際想怎樣做？

總督答（譯文）：首先，對於這位議員表示高興我能夠回港——我知道這是跑馬地裏大多數人的看法——我很感謝，亦想對這位議員說，當局很感激他及其他議員對區、黃兩人事件的關注，也很感激香港旅遊當局對這事件的關注和支持，我們也明白，除非這事件得以解決，許多議員、像楊議員，及其他社會代表，會繼續就區、黃兩人的處境向菲律賓政府及香港政府施加壓力。

我相信這位議員會明白，立法局議員和總督在跟進這類事件時，總有困難，因為我們不願對法律意見妄加猜測，不願罔顧當事人的家人對事件的關切，亦不願以可能不合理的方式左右那些關注事件的人士的意見。在這些情況下，是很難以負責任的態度提供意見的。

在我與菲律賓當局討論這事件時，的確獲知當事人必須走完一切法律程序，才可獲得赦免。但我相信，這絕非一項建議，也不是討價還價；而只是把情況率直說明。

我不認為除了促請菲律賓當局盡快處理這事件外，我還可以做些甚麼。我認為，我不應做一些看來像猜測菲律賓司法當局的決定，或干預菲律賓司法程序的事情。但我們可以合理地說，這事已經拖得太長了。

這兩人士在一九九一年被判刑。各位議員也知道，他們自一九九三年起便提出上訴。但他們等待當局考慮他們的上訴，曠日持久，這點是立法局及香港社會所關注，也是我們要針對的一點。

我們一直都在努力。據我所知，兩位英國部長訪問菲律賓時，曾提出這件事，而訪問菲律賓的英國官員，亦曾多次提出。此外，英國大使也經常向菲律賓當局查詢。立法局議員亦曾向菲律賓當局提出質詢，而立法局也曾進行討論，並非常清楚地表明立場。

我希望我們可以迅速地解決這件事。我向菲律賓總統指出，我們的關係一向甚為良好；我們的關係牢固，使彼此在談論這件事時，措辭可以頗為強硬。我相信以同樣、甚至更強硬措辭談論類似事件的菲律賓總統，是明白我們對事件的關注是合情合理的，我並跟他說定，若事件不能迅速解決，我會不斷就這事與他接觸。

楊孝華議員問（譯文）：謝謝總督先生。我和其他五位議員曾向菲律賓領事館遞交三封信，要求為我們安排日期與總統會面，向國會及司法部長講話，直接表達對事件看法，到明天上午便足足一個月了。但至今為止，我們仍未收到任何答覆。

在你與菲律賓官員談話中，可有覺得他們並未收到我們的請求，或他們認為並無此需要，還是已表示我們應有準備獲得答覆，不久成行？我們不是想加重菲律賓在聖誕節旅遊旺季的壓力，但或許，我原本在想，我們至少希望可在聖誕或農曆新年之間出發。

總督答（譯文）：我們很樂意向菲律賓政府重提這位議員及其他議員的要求。我並希望這次訪問得以安排，而且若有此需要，能迅速辦理，但我希望不需這次訪問，因為我希望區、黃兩位先生的上訴，不久便獲聆訊，而不是再次押後。

各位議員都知道，當地發生了一、兩樁不幸事件，顯然阻礙了他們上訴的進程。儘管如此，司法上的延誤往往造成極大的焦慮，只要讀過“絕望之樓”或者法制史上其他事件，都會有同感。

主席（譯文）：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問：主席先生，我想透過你向總督先生提出問題。昨天魏京生被判監14年的事件，使香港人十分擔心，因為香港經常出現類似的言論、思想，即一些與中國政府有矛盾，甚至是不同的看法。在香港而言，這是言論自由。至於顛覆的問題，據我了解，而我亦曾向法律界人士請教，普通法內並沒有顛覆的概念。不過，《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卻有關於顛覆的規定。雖然剛才你已回答張文光議員的問題，但我想請問總督先生，由於英國政府將來要把香港交回中國，你有否想過在九七年之前要求中國清楚解釋顛覆的定義及與普通法的關係？

總督答（譯文）：有關這位議員所提的第一點，如果我不再次表白我對這一事件的想法，希望他不曾以為這是不敬或對魏先生的處境漠不關心。我剛才答覆另一項質詢時已頗為詳盡地說過我的想法，我也不願重複那些我感受強烈的論點。

至於議員質詢的第二點，這正是我們希望在中方回應我們提出的建議時可以透過聯絡小組來討論的。這位議員說得不錯，要把北京剛在過去24小時之內才執行過的概念跟普通法調和，談何容易。我可以說些英國政治史中能夠與之相提並論的事件，但又恐怕提出來會為我惹來麻煩。我確實認為《基本法》和普通法之間有不甚協調之處，而我們獨立的法院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地方，這點我以前也有說過。很多議員就香港政府發表過不少文章或言論，但今天仍在這裏向我質詢。

主席（譯文）：謝永齡議員。

謝永齡議員問：謝謝主席先生。最近堅尼系數顯示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日趨嚴重。昨晚本局通過有關老年退休金的議案，而我們亦知道在本港60萬老人中，只有7萬人領取綜援金，仍有很多老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我想請問總督先生，在不會引致“車毀人亡”的情況下，如何解決日趨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

總督答（譯文）：我認為我們不會有撞毀汽車的危險。正如國際貨幣基金最近指出，我們畢竟已通過了高級駕駛考試。如果有機會，我會再提及這一點。我們剛與國際貨幣基金舉行了定期會議，即所謂有關“第4條”的會議。國際貨幣基金會定期檢討個別國家的經濟情況，他們對香港的評價是最理想不過的。他們只是擔心情況會促使我們偏離我們一直推行的政策，不過，我們絕不會這樣做。我很希望國際貨幣基金及國際建設開發銀行的英國代表把該等研究結果告知世界銀行的中國總裁後，世界銀行的中國總裁會把這個好消息告知其他中方官員，使他們能夠掌握更多關於香港經濟及管理方面的資料，以便日後討論。

謝議員提到本港貧富懸殊的情況日趨嚴重，我不能確定他所指的是個人薪金的增加或其他數字。其實，大致上，我們每個人都比以前富裕，不過，有些人比別人更為富裕而已。不過，謝議員說得對，在一個繁榮的社會，我們有責任照顧那些不富裕的人、需要幫助的人、貧困的人、弱能人士、病人及有其他需要的人。過去五年來，社會福利援助金有66%的增幅，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因為我們承認這是我們的責任。與此同時，我們亦把公共開支的增長率維持在整體經濟的增長率之下。在同一段時間內，整體開支增長率為30%，而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則為32%。因此，我們一直把資源明智地調配，務求能審慎地控制公共開支，又能給予需要幫助的人更多援助。

此外，謝議員亦提及退休金計劃。從謝議員的身體語言看來，我猜昨天他對退休金計劃是投贊成票的。我只好說，為甚麼數月前，我們需要他支持時，他又不支持我們呢？我們在立法局討論退休金計劃時，我們很希望他可以在那重要關頭支持政府。可惜，只有一位議員在立法局進行辯論時，支持類似我們提出的退休金計劃的概念。我們不能這樣三心兩意、搖擺不定，在春秋兩季支持退休金計劃、在夏冬兩季卻支持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我們必須抱有一定的看法，並堅持這種看法。我們曾經嘗試推行退休金計劃。記得我對着電視台的攝影機，解釋我支持退休金計劃的理由時，卻沒有幾位議員在那場持久戰中跟我站在同一陣綫。當時，我和林煥光先生力主推行退休金計劃，記憶所及，沒有誰來幫我們一把。立法局否決我們的議案，我們又再接再厲，提出其他建議。這些建議得到本局通過，我們現正嘗試推行這些計劃，並會不斷努力。如果不成功，我恐怕任何向老人提供長期經濟支援的計劃都要押後。不過，這些計劃如須押後，不能歸咎於政府。

謝永齡議員問：總督在貧富懸殊的問題上提到弱智人士。其實一份最近發表的報告顯示，八成在庇護工場工作的弱智工友，每月——讓我重複每月——的收入是低於500元。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聘用18萬公務員，卻只聘請了34名弱智人士。計算起來，每1萬名公務員當中也沒有兩名是弱智人士，比率相當的低，即使香港某間快餐店聘用的弱智人士也較香港政府多。請問總督有何方法可增加弱智人士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政府內增加對他們的聘用，從而減低貧富懸殊的距離？

主席（譯文）：我們只可要求闡釋，但不知總督先生是否願意回答。

總督答（譯文）：我一貫甚麼都願意回答（眾笑），不過有時會答得比別人較為冗長一些。

我們就弱能人士的就業問題已經舉行了兩次十分有建設性的高峰會議。我想我們就弱能人士的交通需求方面亦已舉行了三次類似的會議。我認為我們在交通方面較為成功，那是因為地下鐵路及九廣鐵路均作出了十分理想的回應。不過，即使在弱能人士就業方面，我們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我認為整體而言，政府現正讓弱能人士有更多機會加入公務員行列；不過，我沒有分項的詳細資料，亦不能肯定在我們聘用的許多弱能人士中，弱智人士實在佔多少。不過，我知道有些代表弱能人士的團體認為政府有時候在向弱能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時，把弱能的界限定得太寬，不過，我們會繼續多做些工作。我們會繼續設法鼓勵我們的管理階層為弱能人士提供更多求職就業的機

會，而我們亦會繼續為其他僱主樹立榜樣。我認為房屋委員會及醫院管理局均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如果我們看看商界，有些公司亦做得極好。本港一家廣播電台在向弱能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方面，表現十分超卓，但其他公司則似乎很不積極。因此，很明顯，我們每個人可以更為努力。明年我會就這個議題召開另一次高峰會議，檢討自從上次高峰會議以來的進展。

我以前說過，現在也是這樣說，香港需要各種各樣的才能，其中弱能人士的才能對我們也是很重要的。我們並未發達到可以失去任何市民的才能的地步。

主席（譯文）：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問：主席先生，近年來香港經濟疲弱，很多中小型企業都不斷萎縮，導致很多工友要面對失業、工資下降，甚至開工不足的問題。這是過去香港政府或香港整體社會缺乏長遠的工業政策而導致的局面。總督先生可否告知本局，面對現時的困局，香港政府將進行甚麼實質工作，或扮演甚麼角色，以解決目前的問題，幫助更多人脫離失業的困局？

總督答（譯文）：希望這位議員不要介意，我不同意他說我們沒有長遠的經濟政策，而且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論壇和美國傳統基金會對本港成就的讚揚或比這位議員對政府政策的批評來得較為有力。

國際貨幣基金報告中所表示的一點焦慮，讓我用報告中的字眼，是“甚為正面和可以稱道的”，他們唯一關注的地方就是我們不維持現行政策。現行政策使到我們能有今天連續36年不斷的經濟增長。現行政策使到本港成為區域之內以至全世界的自由經濟楷模。

當然，我們不時須作調整，但我不以為我們應調整到舊式的社會主義，我所指的自然不是政治上的意思。我不以為我們應該開始實行使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大為混亂的那些干預主義政策。

這並不表示我們一點都不協助工業界。讓我向這位議員舉出三個例子解釋我的說話。第一，對工業最大的幫助是稅輕，事實上，區域內以至全世界在稅務上實難有比香港更好的地方了。

第二，我們確明白到，香港在就業方面，職位大量移向服務行業，意味我們要檢討有關創造就業機會和整體財富的政策和支援。所以財政司已成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本局一些議員，研究我們可以為服務行業多做些甚麼。這個行業我們過去數年已創造了約100萬個職位，這一點相信我說得沒有錯。

第三，現我轉談一下製造業。我明白即使過去數年來製造業內職位減少了，又即使製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亦降低了，製造業仍然是香港財富來源極重要的一環。在製造業而言，我們現正在多方面努力，協助僱主和創造財富的工人。

首先，我們正提供土地和地方給有意設廠的人。這是工業邨公司所做的；也是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所做的，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舉例來說，向公司提供地方來從事發展和研究。

第二，我們正在協助製造業培訓該業未來所需的技術。這就是我們各大學正在做的事。也是職業訓練局正在做的事，訓練局在各大學校園內所做的也不遑多讓。

第三，我們也在協助技術轉移。這就是我們的應用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生產力促進局正在做的事，剛才提過的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也在從事這項工作。

第四，我們正透過工業支援資助計劃提供大量金錢，今年的撥款上升至2.1億元，以協助製造業從事可以在本港商業中成功開發的高科技發展。

由此可見，我們正從各方面加以援手。說我們對香港沒有長遠的謀劃是不確的。不過我對香港的長遠謀劃恰好就是要香港繼續維持目前的自由開放經濟。

主席（譯文）：梁議員，你想不想提出跟進質詢？

梁耀忠議員問：主席先生，總督先生剛才提到，政府一向推行的是不干預政策，並提出很多有關這方面的工作；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成效實在不大。雖然總督先生剛才說到有關科技中心等問題，但根據我們所得的資料，政府

現時關注和致力推展的科學園計劃，其實並非主要為了發展本港的科技，而只是計劃扮演一個“轉口”的角色，即將外國的科技引進中國，或將中國的科技介紹到外國，因此，對於香港的工業發展，毫無幫助。請問總督先生，能否在這方面多做些工作，或向我們詳細解釋科學園對香港工業的發展實際上有何幫助？

總督答（譯文）：很高興這位議員提起我未有談及的事，而設立科學園的可能性就是其中之一。但我真的不信創設科學園就似乎只是製造一塊彈板，讓中國的技術從香港彈向世界各地。科學園不單可以協助本地製造業，而且大可以把中國的科研人員和本港的製造業連結起來，或把中港兩地的科研人員和本港製造業連結起來，為共同的或更大的利益而努力。

我認為這位議員不應說得好像香港可以在經濟上自我封閉而得到繁榮。我們的經濟是開放的經濟，或可說是舉世最開放的。我們的經濟表現良佳，今年首九個月的產品出口上升了14%，而服務出口則有13%的增長。我們的開放經濟體系大量吸引外商投資在我們的製造業。在我們的開放經濟體系中，私營部門今年在廠房和機器方面的投資會增加20%。所以我們有的是一個成績斐然的開放經濟體系。成功的開放經濟體系歡迎來自別處的意念、資源、人才和技術，使之增加價值，而在這個過程中日趨富裕。

主席（譯文）：黃錢其濂議員。

黃錢其濂議員問（譯文）：多謝主席先生。我想向總督先生提出一項事關重大的質詢，是關乎足以影響香港未來經濟成就的因素。

總督先生，據某些報章報導，你的好友魯平先生曾說過，將來的行政長官可能是一匹黑馬。只要是好馬，管他黑馬白馬。主席先生，我的質詢是：行政長官須具備哪些足以左右香港經濟成就的條件？應是怎樣的一個人？行政長官既然如此重要，須有甚麼程序，才可透過他而使香港繼續享有經濟成就？願聞總督高見。

總督答（譯文）：這位女議員既然提及魯主任，那我便趁此機會祝魯主任聖誕及新年快樂。我希望他繼續康復。也希望他能於明年訪港，並且頻密的到訪。我很希望他每次來港訪問時，不至於忙得沒空見見香港總督。

此外，無論這位議員或其他人心目中的馬是怎樣的一匹馬，最要緊的是香港總督不應加以支持，也不應在其身上押上任何注碼，原因是香港總督賭馬必輸；這是我最近在沙田馬場和快活谷馬場體驗到的。

玩笑開過了，說嚴肅的。我認為港澳辦主任提出關於行政長官的條件，看來很有道理。我不宜說應由誰來出任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也不打算把一己的意見加諸行政長官產生的過程。但是，就這位議員質詢比較狹窄的一點而言，即是行政長官應具備甚麼條件，才有助於香港經濟繁榮，我則認為要有利於保證香港的經濟繼續繁榮下去，當行政長官的，必定要百分之一百零一銳意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百分之一百零一立志秉承香港一貫的營商手法，在專營權與公共合約方面，以有清楚而且公開的程序來處理；在做生意方面，此人亦須堅定不移的為香港的商界提供一個公平的營商之地，決心維持香港的開放和自由經濟體系，繼續以低稅率及審慎的控制開支精神管治香港，並矢志不渝、立場堅定地確保香港的經濟體系由其本人與港人合力管理。

上述的各項條件之中，我認為最後一項尤其重要，所以特別強調。每逢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論壇，以及其他人士論及我們的成就時，他們所指的成就，是港人創造的成就，由港人管理的經濟體系。

香港現時的宗主國雖然是英國，但若說指揮着我們如何管理我們的經濟體系的，是當今的英國財政大臣或財政部官員，有人會相信嗎？英國的財政大臣和財政部官員單是管理英國的經濟體系已經忙個不亦樂乎了，何來餘力理會香港的經濟？

我們得以成功，是由於所採取的政策成功，並且不受別人阻撓或干預。因是之故，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將有大約1 500億元的財政儲備；到了一九九八年，加上土地基金，香港的財政儲備可達3 250億元之巨。這些數目都是我們取得成就的最佳證明。無論誰當特區的行政長官，我們都希望和預祝他能像過往四、五十年的公務員一樣，成功地管理香港的經濟體系。

主席（譯文）：李國寶議員。

李國寶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鑑於香港經濟疲弱、通脹高企，成本急升，工資上漲和租金高昂，請問你可否告知本局政府會採取些甚麼措施來保存我們作為國際財經中心的競爭力？

總督答（譯文）：老天！我不知這位議員說的是甚麼地方。這位議員對國際貨幣基金比我還要熟識。基金的報告出版後，我深信他要跟本局其他議員一樣仔細地閱讀。從他所提質詢看來，大概他會對貨幣基金的報告大感驚詫，但相信其他人則不會這樣。

香港當然有它的問題。通脹比我們所希望的為高，但現時的5%比起本港第28任總督抵港那年的通脹率，幾乎低了9%。我們自然希望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得更多，不過以增長率5%來說，我們仍算不俗，而且亞洲開發銀行和其他機構人士都預測增長會持續至明年。3.5%的失業率當然太高，但我相信整體經濟之中職位仍增加了2.5%，問題是我們的工作人口卻增加了4%，結果便使到失業人數增加。這一切都可以改善，而我亦希望得以改善。

我認為未來一年左右我們的競爭力都不會減弱。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名單中，我們排名第三，比去年上升了一個位置。我看這是頗為不錯的進步。

在地產方面，樓宇轉售市場在一九九四年四月達到高峰以來，已下降了四分之一；而新樓的價格比最高時也回落30%至40%，雖然樓價仍較一九九三年一月的時候為高。因此我認為我們已頗為成功地遏抑了樓價。

大體來說，我們總可以做得更多，總要面對新的挑戰，但我認為經濟上的成就始終會證明一切。我深信在這位議員英明主持下的銀行，之所以成就璀璨，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於香港整體經濟成功使然。

每個人看自己的成績表時都可以發現可以做得更好的方法。但在研究怎樣可以做得更好的時候，我不以為我們就應忘記我們實在已做得很好。使到我們經濟發達的，不是香港總督，而是他屬下的公務員和實際努力耕耘的人。

主席（譯文）：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我想向總督提出一項有關本港14萬菲律賓家庭傭工的前景的質詢；又總督在最近到菲律賓訪問時，有否討論到這問題？相信總督定必知道，對於這些家庭傭工的前景，社會上有很多猜測。不少菲律賓家庭傭工認為她們根本沒有將來。實際上，有些已在數年前開始移居加拿大，就像其他較幸運的香港人一樣。一些香港人，包括本局一些議

員，曾表示政府不應容許他們來港，即使在一九九七年前亦然；而大陸方面可能又說過這是發財的黃金機會，為何要把好處讓給外國人？

由此可見，社會上存有種種猜測。當然，你或會說一九九七年後的事情與你無關。不過，我想知道，你可否與本局分享政府當局目前的想法？因為歸根結柢，我認為我們對這些人尚有未完的責任，那便是讓她們知道，就我們所見，她們的前景將會如何，特別是告訴那些合約於明年屆滿的家庭傭工，她們會否獲得續約和政府是否有權讓她們續約；此外，中國當局有否向你表示，這些人是否可以留在香港，抑或必定全部踢走呢？

總督答（譯文）：我在菲律賓時當然曾經討論過這問題。菲律賓當局對此問題深表關注，這是可以理解的。現時，香港有129 000名菲律賓家庭傭工。在港的菲籍人士約有140 000人，除了上述的家庭傭工之外，尚有約1 000人通過其他輸入勞工計劃來港工作，另有約10 000人從事專業和管理階層的工作，當中包括1 000名國泰航空公司的職員。

現時菲律賓家庭傭工的人數為129 000，較一九九二年我到港履任時增加47 000人，人數在過去十年來急劇上升。我認為社會整體都承認，這些家庭傭工在社會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首先，他們有助維繫家庭的完整和穩定；第二，她們僱主的配偶，本來不能出外工作的，現在都有機會出外就業。因此，在促進社會融洽和經濟發展方面，菲律賓家庭傭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問題間或出現，制度被人濫用的情況也偶然發生，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處理的問題。不過，總括來說，這129 000人確為香港提供了很多支援。

我回答菲律賓總統拉莫斯和其他人士的詢問時亦有指出，我可以作出的保證是有限的，因為一九九七年後政策由特別行政區政府制訂。不過，讓我強調一點，有關政策非由北京當局決定，而是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制訂。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勞工政策是由特別行政區自行制訂的，不關其他人的事。因此，有關菲律賓家庭傭工的現行政策應否繼續推行，將由行政長官及其下屬作出決定。

我很難想像有甚麼合乎常理的理由，足以使事物在一九九七年出現重大轉變，以致本港在一九九六年需要僱用129 000人的各種理由，在一九九八年突然消失。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承認、如果我們同意本港在一九九七年前有大量工作機會，可容納這129 000名女性傭工和少數男性傭工的話，那麼該些工作機會便極可能繼續在一九九七年後存在。我實在很難想像在甚

麼情況下，那些工作機會不再存在。拉莫斯總統和其他菲律賓官員問我這方面的問題時，我便向他們說了以上那番話，他們似乎對答覆相當滿意。

我亦同時指出，根據《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在一九九七年後將維持不變，而在今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下，這129 000人一直為我們服務得相當不錯。因此，我希望她們會相當放心。我們會繼續推行現行的勞工政策，直至一九九七年，我們亦會處理新合約的申請，而有關的工作以後便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

也許我可以補充一點，拉莫斯總統特別向香港表示謝意，感謝香港歡迎家庭傭工來港工作，及確保家庭傭工的工作條件大致上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規定和獲得全面法律保障。我相信不少菲律賓國民都希望在其他國家當家庭傭工的同胞獲得的保障，會像香港所提供的一般完善。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我只想提出一項非常簡短的跟進質詢。現時，政府當然有它的理由，不容許大陸居民來港當家庭傭工。請問總督先生是否認為在一九九七年後，這些理由仍會成立，因而有必要繼續僱用來自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的家庭傭工？*

總督答（譯文）：在一九九七年後，就這些問題提出意見的，預料大致上都是現時的政府官員。假如今天我收到他們的意見，我肯定該些意見會指出，如果要以來自中國大陸的家庭傭工取代現時的129 000名菲律賓家庭傭工，在入境事務方面便會出現困難。我確信在一九九七年後，有人將提出相同的論據；但我必須小心，以免使人覺得我在就一九九七年後的事情作決定。

主席（譯文）：在我宣布本局聖誕休會之前，我謹藉此機會祝願總督、各位議員、各位公職人員以及其家人聖誕快樂、一九九七年事事順遂 — 我其實是想說一九九六年。（眾笑）

總督（譯文）：我相信明年的時間亦會轉瞬即逝，但這樣說我們似乎已經擱下了籌備委員會。我相信籌委會不會這麼快消失的。（眾笑）

我謹祝主席和各位議員聖誕快樂、新年進步。同時，我亦在此祝願那些寧可不在現時身處的環境中度過聖誕節的人士聖誕快樂，並期望他們明年會

較過去一年更愉快順遂。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在宣布休會待續，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續會。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三十三分休會。